

校勘何以为学

刘玉才（北京大学）

校勘能否称之为学？许多学者以为校勘就是古书版本间的对校，不需要专门教授，学生只要能实际去整理古籍，便能掌握校勘的方法，没必要将其作为一种单独的学科。

近些年，北京大学中文系致力于建设中国古典学平台，而中国古典学的核心便是中国古典文献学，与西方的古典语文学相对应。在西方语境中，古典语文学是一门运用诠释学，基于源语言以理解文本的学问，其基础地位等同于数学与哲学；它致力于文本及其历史的研究，通过文本对勘和比较研究，还原文本的语言和历史语境，达到理解和重构文本本来意义的目的。中国古典文献学与西方语文学在方法论层面上高度重合，因此我认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不应局限于文献表象的著录、描述和发掘整理，而应经由语言文字路径，深入文本，探究其生成变异、阐释理解的过程，达至揭示文本意义的目的。这也就是张之洞所说的“由小学入经学者，其经学可信”（《书目答问·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》）。而最大限度地解读文本，校勘就是其重要方法。

近些年，以沈卫荣为主的学者提出要回归语文学，实际上我们应该回归文献学。文献学应该跳出现代学科体系的羁绊，回归到方法意义的本位：应该通过文本的校勘、史实的考据来还原历史的语境和文本面貌，来揭示文本的意义。它的落实，实则是对过于重视理论的一种反驳。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，乾嘉考据学是我们建构中国古典学的重要学术资源。乾嘉考据学者不仅具有由小学入义理的学术理念，而且在文字训释、古音辨析、名物考据、天文历算等领域都有非常杰出的贡献；特别是在文本层面，离析文本层次，以贾还贾，以孔还孔，对经、注、疏文本的分合，尤其是在经典校勘的方面贡献卓著。此外，在文本辑佚、辨伪等方面亦具有非常突出的业绩。可以说，在重视语言文字、重视文本校勘、复兴古典方面，乾嘉考据学者与西方古典学者的方法是异曲同工的，这为我们建构中国古典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传统校勘学通常是指对某部书籍，用不同的版本和相关的资料加以比

较核对,以考订其文字异同,辨别正误。校勘学往往要追溯至西汉刘向奉成帝之命校勘秘府之书,但实际上刘向校书是以文字内容的校勘为基础,以编次定本为目的。因而其含义更为丰富,包括编次篇目,是正文字,分别部类,梳理源流。由此观之,中国古典文献学也应该结合古书体例的探讨、版本源流的梳理、文本层次的分析,来观照文本校勘,也致力于一个定本的确立,这便是校勘学的广义性所在。

校勘学首先应该梳理异文,而异文的产生和文本的流传过程密切相关。关注异文,必须关注到文本的流传过程。古书的文本差异往往可以分为:讹(形讹、音讹)、脱、衍(羡文、衍字)、倒(乙文、错简),以上均可称之为异文。文本经历了口传时代、抄传时代、印本时代,不同时代异文产生及表现形式往往有所区别。口传时代,因为辗转的传说,郢书燕说的现象比较普遍,因此将其记录下来难免存在差异,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写本时代。写本抄传的时代,既有简册散乱导致的文本错简现象,又有字体演变造成的古今字、异体字、错别字的差异。在抄写过程中,囿于抄手的水平,又会产生俗字、减字、错别字等情况。抄本不但数量繁众,传承难明,而且随意性强,极易产生异本异文。抄写者有抄写的脱漏,有无意的增添,也有臆断的擅改,还有无知的妄改,过度的文字加工甚至改变了原创作品的面貌。故而写本文献的校勘有其独特性,如口讹、形讹、笔讹、主观臆改等等,在校勘时要更加慎重。同时写本文献的文本具有流动性,它正处于进行时的抄录改易阶段,经过存优汰劣,逐渐趋同,最终成为今天为人们所熟悉的文本状态,因而校勘时要充分考虑这一特性。

因为异文的存在,故而历代往往注意正定经典文字。由于竹简易于散乱、容易损毁,而金石可以保持永久,所以经典定本首选的载体就是刻石,因此出现了熹平石经、开成石经等一系列石经。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和《封氏闻见记》分别记录了熹平石经与开成石经的立石过程,两种石经处于字体演变的关键时期,具有非常重要的正定文字的象征性意义。与之并行的,官方还颁行诸如《五经文字》《九经字样》等书,用于正定字形,确定官方正本。后世认为开成石经为刊本之祖,它是唐代官方颁布的标准字形,至今仍可作为制定正体字的借鉴;它所取式的王弼、郑玄等注本,为五代北宋所继承,等于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汉魏经师注本;没有九经十二部的开成石经,经典发展或许是另一种样貌。但在官方正定的过程中,也存在一些问题,如从孔安国的隶古定到唐代五经定本,再到唐玄宗开元、天宝间改易古文为今体,都会对文本的面貌发生一定影响,并通过定本形式流传,而许多错误便由此延续下来,影响后世。

宋代开始进入印本时代,学者、编者、校者继承的是丰富而混乱的写本

遗产,不得不面对众多抄本异文,并从中选出正确的文本。较之于以往的正定字形,北宋时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文本的差异产生了强烈的关怀,由此产生了对于善本的追求,校勘精良的善本也成为世人追逐的对象。另外,此时期校勘之学上升到官学地位,以馆阁人员为主体,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之上对历代正史、诸子要籍、医药典籍进行了全面的校勘,并刊印颁行,成为影响广泛的版本。然而我们在肯定宋人校勘工作的同时,仍需对其加以反思。古籍编校工作当置于朝廷搜求佚书,拾遗补缺,丰富国家文献收藏的背景之下予以考察,方可给予恰当的评价和地位。馆阁校勘的首要工作是搜求散佚文献,尽力恢复古籍旧有结构面貌。其次,对于唐前古籍编校具有追求恢复原貌的完本倾向,但同时亦兼顾订正文字、形成定本刊刻的现实需求。最后,宋代馆阁校勘虽有规章制度的约束,甚至每日量化的校讎要求,但是多限于同本的寻行数墨、检核讹错,缺乏学术层面的异本梳理、异文考证。因此,宋代古籍校勘,除馆阁与国子监通力合作的正经正史等通行经典,其余水准似不宜评价过高。

宋代除了馆阁校勘之外,实际上对异文的取舍存在比较大的裁量度,一些宋人的校勘编辑在后世看来主观性较大。比如说柳开校定韩愈的文集时,其改动多达五千多字;方崧卿校勘《韩集举正》时“尤尊馆阁本,虽有谬误,往往曲从。它本虽善,亦弃不录”,而朱熹《昌黎先生集考异》“悉考众本之同异,而一以文势、义理及它书之可证验者决之。苟是矣,则虽民间近出小本,不敢违;有所未安,则虽官本、古本、石本,不敢信”。今世学者反思宋人这种大胆的校勘时,认为其存在一种求真的误区,如田晓菲所撰《尘几录: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》(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22年)。批评者认为田氏扩大了写本的差异性,但我认为她所指出的这种现象是存在的,也是值得重视与思考的。当然并不是说异文取舍能够完全改变对陶渊明的评价,但是在某首诗、某篇文章的理解上,因为异文选择的不同,可能阐释的取向就会不同。

印本经历了宋人对于异文的选择、改造,在这一背景下,我们就应考虑写本的可贵。若基于文献源流的考察,写本时代的古书包含着丰富的文本及附加信息,而这些信息在写本转换为印本的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的损失。同时,一旦印本作为定本形成,那么之前的写本就逐渐亡佚,而在写本转换为印本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便无从查证。宋代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,叶梦得感慨道“世既一以板本为正,而藏本日亡,其讹谬者遂不可正,甚可惜也”。实际上现在研究出土文献的学者也意识到这一问题,朱德熙先生在《七十年代出土的秦汉简册和帛书》中指出:“比起宋以后的刻本来,唐代类书用的本子以及敦煌唐写本,跟竹简本或帛书本要接近得多。这

说明印刷术的兴起一方面减少了古书失传的可能性,另一方面却增加了比较剧烈地改变古书面貌的可能性。刊刻的古书由于所据底本不善,或是刊刻者出于牟利的目的草率从事,往往错误很多,而刻本的出现又可能导致各种抄本失传,以致好的本子反而被坏的本子淘汰。”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利用到的敦煌文献、简帛文献,包括流传到海外的古写本,为文献校勘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。但是,写本时代的文献和印本时代的文献,各自有不同的源流,不可完全置于同一层次进行校勘。

当然,印本本身亦有其重要意义。书籍进入印本时代之后,极大地促进了文本的稳定,也可以说进入一个定本时代,用李零老师话说就是进入一个固态。一旦进入印本时代,即使辗转翻刻,异文数量也较写本时代减少,且异文往往是有规律可循的。宋代早期的官方刻书不以盈利为目的,注重底本的选择、文本的校勘和刊印的质量,所以宋本至今为人所称道。我们现在谈宋代普及雕版印刷,往往是比较多地注重其在传播、扩展书籍流通范围方面的作用,实际上宋代雕版刊印在刊定、规范典籍的文字方面也起到积极的作用。它对于文献的定本化、规范化,不亚于它的传播意义。同时,宋人刊刻时见到大量古旧抄本,流传至今的印本,特别是官方刊刻或地方政府刊刻之本和私家的一些精刻本,大多是汇聚众本、择善而从的结果。

官府的刻书和一些私家的精刻本,不以盈利为目的,注重底本的选择,质量比较高,但是随着印刷的商业化,书坊刻书、印书,追求高效速成,多不讲究底本选择、文字校定,甚至增删字句、割裂内容,导致古书失去其原本面貌。在此背景下,追求善本成为时尚,善本对校成了校勘学的灵魂。胡适《校勘学方法论》指出:“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:必须有善本互校,方才可知谬误;必须依据善本,方才可以改正谬误;必须有古本的依据,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。凡没有古本的依据,而仅仅推测某字与某字‘形似而误’,某字‘涉上下文而误’的,都是不科学的校勘。”写本时代的校勘,文本校勘多是文字的纠误和字形的订正,其依据在文本内部或它书征引,这是由抄传文献复杂性决定的。进入印本时代之后,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版本的概念,不同版本间可以进行版本源流的梳理,逐步建立起基于版本谱系的校勘学。

基于版本的校勘方法,陈垣先生曾总结为“校勘四法”,即对校法、本校法、他校法、理校法。其中对校法,实际上就是基于版本谱系的校勘,类似于西方校勘学的谱系法。稍有不同的是,西方校勘学的谱系是建构写本的谱系,并对之校勘。理校法即在没有版本依据或者是数本互异、无所适从的情况下,据理分析,判断是非,类似于西方校勘学的折衷法。当然在实际校勘中,往往是各法并用、综合考察。总的校勘路线是发现错误,改正错误,证明所改不误。至于校勘的理念,清人分为“求古”“求是”两途:求古的理想就是

存真复原,尽量接近文本的初始形态,所以说只校异同、不校是非,即顾广圻所云“不校校之”。求是,即段玉裁所云“凡校书者,欲定其一是”,确立定本。

我们传统的学术话语体系中,实则包含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校勘原则,如宋彭叔夏《文苑英华辨证序》所云“校书之法,实是正,多闻阙疑”。阮元校勘时,亦保持谨慎的态度,如《江西校刻宋本〈十三经注疏〉书后》云:“刻书者最患以臆见改古书,今重刻宋板,凡有明知宋板之误字,亦不使轻改,但加圈于误字之旁,而别据校勘记,择其说,附载于每卷之末,俾后之学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据,慎之至也。”倪其心先生《校勘学大纲》也特别强调校勘工作要存真复原,他说:“校勘范围的考证,主要是调查核实原稿的文字形式,原则上不涉原稿的内容是非和文字正误。校勘者不必对被校勘古籍原稿内容是非表态,也不需对被校勘原稿本身的错别字负责。也就是说,应当把校勘的判断文字正误,与原稿内容是非、文字正误区别开来。”

校勘学归根结底,还是要明确校勘的目的何在?段玉裁《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》提出“底本之是非”“立说之是非”,“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,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”。由此,“校经之法,必以贾还贾,以孔还孔,以陆还陆,以杜还杜,以郑还郑,各得其底本,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,而后经之底本可定,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”。段玉裁所云,实则就是离析文本层次,而离析文本层次恰恰是文本学非常重要的工作。文献的文本尤其是先秦两汉早期的经典文本很多都是叠加形成,有着不同的文献来源,只有先离析各文本层次,才能判定其是非。校勘的目的又与古籍整理密不可分,由于校勘目的不同,所以古籍整理又会采取不同的形式。钱玄同先生《校勘学》将古籍整理的校勘成果概括为三个类型:定本式,根据校勘的结果,把底本的误字、衍文、脱文、倒置以及篇章等错误,改正过来,成为一本定本,在注中作校记;底本式,不改动底本,在注中作校记,或书后附校勘记;札记式,不录原书全文,只录校记。

根据以上梳理,再回到开始时讨论的话题——校勘何以为学?我们可以看到,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结构是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目录、版本、校勘诸学,而校勘学在其中居于中坚地位,是中国古典文献学核心的学问。校勘学又与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目录、版本密不可分,校订字体演变导致的字形讹误,同音方言、通假导致的因音讹误,字义训释导致的本文改变,关涉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之学;基于版本谱系的文本校勘,则与目录、版本之学密不可分;辑佚、辨伪之学,亦离不开文本校勘的支持。我们今日进行古典文献学理论的再构,应当摒弃对校勘学獭祭异本、寻行数墨的刻板认识,将其视为文本史源考察、文本层次分析、版本源流梳理的学术基础,共同构筑古典文献学的基石。